

▶ 云南爱国主义历史丛书



“一二·一”运动

高 整 军

6.51

云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出版说明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 and 向心力，它使中华民族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云南各族人民，勤劳、聪慧，又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他们为维护西南边陲领土主权的完整，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他们的活动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爱国主义的瑰宝。为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遗产，激发人们高度的爱国热忱，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云南爱国主义历史丛书”。

这套丛书着重介绍云南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以反映云南各族人民在内忧外患的危难之中，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及在各领域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这是对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对青少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的具体贯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

一部云南近现代革命运动史，可以说也是云南近现代的爱国运动史。丛书突出爱国主义这条主脉，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尽可能将知识性、思想性融为一体，做到寓理于史，通俗易懂。尽管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力不从心，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丛书由杨德慧、吴妙玲、林超民、高光汉、文思启五同志组成编委会，林超民任主编，高光汉、文思启任副主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一二·一”运动

目 录

一、通向光明或黑暗的交叉点.....	(1)
二、1945年的云南时局.....	(6)
希望的一年、失望的一年.....	(6)
昆明民主堡垒.....	(12)
三、拉开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	(23)
枪炮声中的时事晚会.....	(23)
针锋相对的罢课斗争.....	(29)
四、反内战运动掀起高潮.....	(38)
血写的12月1日.....	(38)
“凶手，你逃不了！”.....	(43)
灵堂公祭、扩大宣传.....	(48)
高涨的反内战浪潮.....	(51)
五、停灵复课、争取胜利.....	(57)
粉碎敌人阴谋、坚持有条件复课.....	(57)
有利有节、实现停灵复课.....	(62)
六、盛大出殡、扩大战果.....	(68)
斗争在继续.....	(68)
盛大出殡.....	(71)
七、人民的胜利.....	(74)

一、通向光明或黑暗的交叉点

1945年8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人力、物力消耗殆尽，无力再战，终于被迫发出乞降照会，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随即宣告结束。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约21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并作出巨大牺牲的广大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战后的中国能出现和平民主的局面。

胜利之初，天边也确实出现了一抹迷人的彩霞。战后要求和平民主的世界潮流，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勇气；经过八年抗战，显著增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增强了人们获得和平民主的信心；蒋介石关于“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惨重，今胜利甫告实现，复兴时机不可复得，正宜同德同心，积极龟勉，进行建国之工作……”的表示，着实迷惑了一些人，使其对和平建国产生了美妙的幻想。

中国共产党坚决站在人民一边，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把争取和平民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

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毛泽东指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8月28日，毛泽东不避艰险，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的真诚态度，毛泽东无畏无私的伟大行动，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1945年10月10日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会谈纪要》，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政治民主化的途径”。人们对中国的光明前途充满了希望。

但胜利的喜悦尚未消失，期盼和平民主、国家独立富强的希望刚刚升起，内战的阴霾已遮蔽了天际那一线光明。国民党蒋介石只是把和平当作发动内战的烟幕，实际上则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企图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通过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重庆谈判以前、谈判中和谈判协定刚刚签订之后，国民党接连调动百万大军疯狂进犯华北解放区。11月初，又出兵关外，以“接收主权”名义，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11月间，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拟定对解放区的通盘作战计划，企图在6个月内就在全中国范围击溃人民军队主力，而后按42个军区的划分进行分区“清剿”。到12月初，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包括它动用的伪军和日军在内，总兵力已达195万人以上。同时，蒋介石还在其统治区域加强法西斯专政，肆意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并在收

复区规定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掠夺收复区人民仅有的一点财富。四大家族却大发“接收财”，官僚资本急剧膨胀到200亿元之多。国民党蒋介石权力所到之处，抓丁、拉夫、征粮、征税，滥发纸币、物价腾飞，工商倒闭、哀鸿遍野。日夜盼望抗战胜利的各阶层人民，盼到的却是沉重的苦难。

美国则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以达其独霸中国的罪恶目的。美国以现代化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又用飞机、军舰抢运蒋军到华北、华东各大城市、交通沿线和战略要地，还调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控制港口，肆无忌惮地侮辱和侵害中国人民。

抗击日寇的民族解放战争结束了，人民付出极大牺牲，渡过了苦难的岁月，渴望和平，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祈求国家独立和富强。且经过八年战争，国家民族的元气大伤，需要医治创伤。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作为实在与人民的意愿相去太远，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并非就是人民的胜利，人民的心被失望和绝望所吞噬，中国处于走向黑暗还是走向光明的关键时刻。腐败与黑暗，进步与光明，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向往的光明前途，为了保卫人民胜利的果实，中国共产党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顽抗，从敌伪手中收复了大小59座城市和广大农村。同时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对蒋介石猖狂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接连取得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胜利，并击退了国民党对张家口的进攻，用战斗来保卫人民得到的权利。

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进攻解放区的反共前线，首先发生了反内战起义。国民党高级将领、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8军军长高树勋，于进攻解放区的战场起义，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王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也放下了武器。他们选择了光明的前途。

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一切，一意孤行，坚持要打内战，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深受其苦。日本投降后，国统区人民和平的希望很快成为泡影。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抢夺财物，追索金子、车子、房子、女子；许多残害人民的汉奸、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工人员”和“先遣军”，继续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物价继续上涨，失业人数激增；为了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仍然向人民派粮派款，任意苛索。山西祁县绅商各界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说：“日寇抢掠，社会财富枯竭，民生已濒绝境，方幸抗战胜利，重睹天日，乃至阎长官返归太原，迄今两月，不闻善后措施，9月份派公款1000万元以上，又派公款100万元。军粮、军服尚在另派之列，10月份又派公款1300万元。一般商家20至30万不等，小贩菜摊也负此数。日寇不惟尚未解除武装，晋军且与汇合剿匪，在铁路沿线修碉堡，抓丁捕人，以至路绝行人，全境骚然。人民何罪，遭此荼毒！”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境况的真实写照。就连拥护蒋介石的《大公报》也不得不叹息道：“千万人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尤其使国统区人民感到绝望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破坏重庆谈判，到处挑起战端的罪恶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人民选择了光明，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迅速兴起，国

民党统治区几乎变成了一座喷射欲出的火山，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必然会引起一场反美反蒋的熊熊烈火。

二、1945年的云南时局

抗战胜利前后，由于云南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民主力量最集中的地区和国民党中央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环节。

希望的一年、失望的一年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抗战前这里一直被当作“化外”的荒漠。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当国民党政府迁驻重庆后，云南的地位日益变得重要起来。它成为供应抗战前线 and 后方人力、物力的重要基地，它的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是当时南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云南这种重要的战略地位，使云南人民的负担远远超过其能力所及。抗战期间，云南除上缴征实、征购、征借粮食外，还要承担驻滇蒋军40万，美军1万和各种内迁人员近百万人的军需民食。沉重的负担压得云南人民喘不过气来。此外，云南虽为大后方，但自1938年—1944年，日寇以昆明、蒙自、个旧、龙陵、保山等市、县为主要目标，不断派飞机窜扰，云南人民深受日寇轰炸之苦。1943年，日寇直接侵入滇西龙陵等地，云南人民更经受了日寇铁蹄的践踏。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云南各族人民怀着对日寇的仇恨，竭尽所能贡献于抗战。数万名滇军健儿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打击日寇。后方人民在胜利第一的前提下，奉献了自己的钱财和劳力，牺牲

了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根据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3年7月的一份统计，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在滇修筑铁路、公路及机场共征用民工398,200多人，实做2,5亿多个工（每人工作日为1工）；架设电讯线路共征用民工255,000多人；各部队向各县共征用骡马19400多头。为了抗战，云南人民忍受着国民党驻军、宪兵、特务的蹂躏，忍受着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压迫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指望胜利后能过上太平日子。

终于，云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争来了胜利，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饥饿、失业、重税和独裁统治。从抗战开始，云南就成为征税、征粮最重的地区，征兵拉丁也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抗战期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就因此发生过多起反抗斗争。蒋介石的陆军总部当时设在昆明，驻在昆明市郊和一些专县的蒋军、宪兵、特务胡作非为，为害人民，国民党蒋介石和云南各族人民的矛盾一直处在激烈发展之中。日本投降后，上述状况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恶化。据1945年11月的一份统计，云南全省77个工矿企业中，已有37个倒闭，12个半瘫痪，2个紧缩开工。抗战期间流落云南的沦陷区同胞约25万，有10万在昆明，胜利后大量失业，流落街头。为了加强独裁统治，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钳制舆论，限制言论自由，强化邮电和新闻出版的检查，压制人民发表爱国主义的言论，还不顾一切，一意孤行，发动内战。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曾在《时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人民疑惑、绝望、不堪忍受的心境：“八年抗战，人民的汗流干了，钱被榨完了，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村破产，都市萧条，粮食缺乏，交通困难，饥荒遍地，盗匪横生，物价高涨，教育停顿，中华民族

真到了严重的关头，休养生息之不暇，怎么能再来一个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大破坏？”“全国除了少数好战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以外，人民无法生存……再打内战下去，人人受罪，人人受苦，人人被牺牲，人人无活路。”“不是为别人，单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也非反内战不可。”严酷的现实激化了云南各族人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本来就尖锐的矛盾，也酝酿了人民胸中反内战、争和平民主的炽烈情绪。

抗战胜利后，不仅云南各族人民与美蒋反动派的矛盾白热化，云南地方势力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亦随着抗战的结束愈演愈烈。云南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龙云同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自1927年“二·六”政变后，龙云逐步成为云南王，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云南虽为蒋介石统治下的一个行省，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在这里却不能完全行使。蒋介石历来不能容忍独立于己的其它势力存在，但在抗战前，一则他忙于内争和“剿共”，鞭长莫及；二则，龙云的野心未超出云南，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需要，他还追随蒋介石的反共路线，双方互相利用，矛盾是潜在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势力不断伸入云南，龙蒋之间潜在的矛盾发展并尖锐起来。1938年，蒋介石将龙云精锐部队的主力抽调出境，到湖南等地参加抗战；1939年又借滇越国际线被截断之机，首次派中央军入滇；1941年，蒋介石在云南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并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杜聿明为司令，进一步控制云南军事。随着中央军大量进驻，大批特务也进入云南，利用公开职务，专力对付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反蒋人士。他们搜集情报、跟踪暗杀，干尽坏事。1940年

前后，蒋介石还要龙云划分云南财政和地方财政，将所属地方官僚资本所积存的物资、现金，一概交国民党中央。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先后在云南境内集中了大量军队，加上美国空军、陆军等部队，大军云集云南，交通运输补给等等负担极其严重。尤其是美军因在云南各地建筑机场、营房、宿舍，占用土地，征购建筑材料等等问题都直接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生关系。这一切，严重危及龙云在云南的统治和地方势力的利益。龙云利用各种机会同蒋介石明争暗斗，与中央争权夺利。龙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身份，明文规定，任何军队不经他的批准，不得进驻昆明市区，以限制蒋军在云南的行动；又规定昆明市治安由地方宪警负责，其他任何机关不得捕人，违者以破坏社会秩序论处；蒋介石的“中央银行”来云南设分行，“资源委员会”来云南插手工矿事业，龙云除设置障碍外，还成立“富滇新银行”和“云南人民企业公司”与蒋介石竞争，蒋龙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充分注意到龙蒋之间的矛盾。南方局多次指示，在云南要切实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团结地方势力。1938年，朱德曾亲自做龙云的工作，致函龙云指出：“抗战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团结无论如何必须巩固扩大。全国同胞抛却过去旧嫌宿怨，合亿万人心为一心，本抗日高于一切之原则努力做去，则胜利自然在危难中、险阻中获得。”同年，中国共产党委托王若飞同志的舅父、著名民主人士黄齐生（曾担任过云南实业厅长、与龙云有过交往）到昆明，劝说龙云坚持团结抗日，进行民主改革。1939年，南方局派马子卿来滇任省工委书记，行前，周恩来、董必武向他交待，除做好群众工作外，要利用蒋介石和地方势力的矛盾，宣传

党的政策，做好争取团结地方实力派的工作。皖南事变前后，云南省工委曾经通过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会长刘震寰等人转告龙云，建议他再次向国民党中央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同时提醒他防备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1941年6月，郑伯克接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省工委继续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从各方面加强了争取团结龙云、护国元老、开明士绅、学者名流和社会进步人士的工作。1943年，省工委通过关系向龙云指出蒋介石采取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蒋介石军队的主力部署，一是用来包围陕甘宁边区，二是用来对付异己。省工委还通过地下党员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向龙云提出了有关坚持抗日、支持民主进步活动、办好地方经济、支持办好进步报刊等十点书面建议。1943年6月，南方局派周新民、李文宜来昆明，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是年10月，南方局应龙云之请，派华岗为党代表和龙云正式建立秘密关系，并通过龙云的电台同延安、南方局建立通讯联系。华岗每月会见龙云一次，互通情报，交换意见，还多次向龙云提出支持民主活动、促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的统战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龙云认识到，在当前举国抗日的气氛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如果继续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将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对于自己继续维持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也是不利的。龙云暗中和共产党建立了秘密关系，后又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支持抗日民主运动的开明态度，对蒋介石控制云南的活动加强了抵制。蒋介石来昆明办报纸，龙云除了扩大办报外，还支持进步人士大量创办刊物；蒋介石几次派特务头子戴笠、康泽等到昆明进行破坏活动，

要求龙云逮捕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都因拿不出证据被龙云制止了。龙云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态度消极。特别是抗战后期和日本投降后一段时间内，龙云不仅暗中同情支持和平民主运动，还公开表示支持国共和谈，反对内战，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对龙云早已视为异己分子，对于他的政治倾向则更加怀疑和不满，决心要解决龙云，“统一”云南，只是没有适当机会罢了。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安定”后方，支持内战，也为了全面控制云南这块“自由”太多的地方，解除后顾之忧，便着手部署筹划剪除龙云势力。第一步，蒋介石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命令云南军队入越受降。卢汉统率滇军主力60军、93军、暂编19师和暂编22师入越后，蒋介石即将其嫡系部队陆续安插到云南。第二步，蒋介石又在滇越边境配置了力量占优势的中央军，监视牵制入越滇军。在改组云南省政府前夕，蒋介石派何应钦到河内，以视察受降为名，控制卢汉；接着又派空军司令王叔铭携带自己的亲笔信飞到河内，宣布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以笼络卢汉。第三步，派李宗黄飞抵昆明，潜伏在国民党驻昆鸿翔伞兵部队，会同杜聿明、邱清泉解决龙云。最后，蒋介石亲自坐镇西昌，遥控昆明。而龙云此时尚未查觉，他以为抗战刚刚结束，重庆谈判正在进行，对滇军的调动并未引起足够的警惕。1945年10月3日凌晨，昆明市突然枪炮声大作，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遵蒋介石之命，对龙云发动了突然袭击。杜聿明指挥第5军第207师、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部的4个团、宪兵13团等，占据了昆明市的军事要地，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同时攻击龙云武装部队的各据点。此时，龙云身边只有1个警卫营据守抵抗，他所属驻北校场的2个团，为杜聿明部所阻无

法入城。同时，昆明全城实行戒严。龙云遭到突然袭击，抵抗了3天，终因兵力单薄，无法坚持下去，只得于10月5日同蒋介石派来做工作的宋子文同机飞往重庆，置于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

蒋介石发动“云南军事政变”，剪除龙云后，便打着“滇人治滇”的幌子，派其亲信、云南鹤庆人李宗黄到昆接替龙云，兼省府代主席，以建立忠于他的嫡系统治。曾在大革命时期欠下云南人民血债的李宗黄，以代理省主席的身份掌握云南省政府大权后，立即大批撤换云南省政府要员，搜捕龙云所有地方武装的头目，分散改编滇军，企图彻底消灭云南地方势力。这一时期，特务遍布昆明，随着逮捕民主人士，龙云执政时期尚有的若干民主权力荡然无存，激发了云南各界的反蒋情绪，从而使蒋介石在云南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昆明民主堡垒

云南历史上素有民主传统。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云南的民主空气一直比较浓厚。1915年——1916年的反袁护国战争，是云南各族人民民主精神的大发扬。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昆明人民响应“五·四”掀起的民主斗争，对云南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26年11月，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在昆明建立，积极推动云南民主运动的发展。1927年推倒滇系军阀唐继尧统治的“二·六”政变，是云南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成果。随着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云南地下党遭到破坏，民主

运动暂时消沉。1935年12月，云南地下党组织在遭到1930年的严重破坏之后恢复重建，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1938年5月合并为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云南爱国民主运动也随之恢复发展起来。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昆明爆发了各大、中学生5千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1937年上半年，云南地下党领导成立了公开的抗日组织“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并创办了《云南学生》。通过这些组织和刊物，中国共产党把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广泛吸收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学抗会组织街头宣传队及学生假期回乡宣传队，把抗日救国的思想遍播昆明的大街小巷，遍播全省城乡，以发动全民抗战。云南社会各界先后成立各种救亡组织，妇女界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部分工厂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通过读书会、工人夜校、讲习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抗战开始后，云南成为大后方。大批工厂、机关、学校先后迁来昆明，使一向文化落后的昆明，成为人文荟萃的地方。大批学校南迁，新学校纷纷成立，文化单位增多，昆明愈发显得生气勃勃。

1938年初，西南联大迁入昆明。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具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北大等校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聚集着一批富有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的教师与青年学生，共产党的影响很深，校内有地下党的坚强领导。联大还集中了大量当时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教授和全国各地学习成绩优秀的青年。联大从长沙南迁时，有200多师生组织了“湘黔滇旅游团”。他们历经68天，行程3500华里，长途跋涉，接触群众，了解民情，经受了锻炼，培养了艰苦精神

和互助风气。联大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昆明的文化科学水平，壮大了学生队伍，带来了学术自由、求实精神和民主学风，还带来了“五·四”、“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的革命传统，对昆明大中学校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云南省工委及时抓住有利条件，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促使外来的民主力量迅速和本地民主力量汇合一体。1938年8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将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共产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同云南的“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合并，统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总队部”（仍简称“民先”），统一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青年工作的领导。1939年初，中共云南省工委正式成立时，便在联大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并以“民先”成员为骨干，在各种公开的社团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联大的“群社”和中共云南昆明支部领导的“民众歌咏团”。“群社”是联大最有实力的学生社团，它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为骨干，通过开辟“民主墙”办壁报，召开时事报告会、讨论会，组织旅行、球赛、歌咏、戏剧演出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在联大校内进行抗日民主宣传。假期里，“群社”成员则到农村举办民众阅览室、慰问抗日军人家属。他们还定期在中小学举办俄文讲座、社会科学讲座、世界语讲座，民众夜校，公演宣传抗日的话剧，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在社会上影响广泛，深受学生和市民的欢迎。正如一位助教所说：“这些民主的小集会，经常有自由的歌声，给人不小的力量。往往在极端苦闷时，因有一个晚会而重新振作精神。”“民众歌咏团”是在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和昆明支部的领导下，1937年和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同时建立的。当时，各学校、工厂都相继成立了